

上海“孤岛”文学资料

上海“孤岛”文学  
回忆录

上海“孤岛”文学资料丛书

上海“孤岛”文学资料

上海孤

孤岛文学资料丛书

文学资料丛书

文学资料丛书

上海《孤岛》文学资料丛书

上海《孤岛》文学

回忆录

〔上〕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上海“孤岛”文学资料丛书  
**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  
上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 北京发行所发行  
603 印刷厂排版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印张 2插页 334千字  
1984年3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6,000册

统一书号：10190·149 定价：1.95元

# 小 引

柯 灵

思想领域没有真空，感情领域没有真空，人民的心没有真空，表达人民心声的文学也没有真空。因此盛世有文学，衰世有文学，甚至在外国人的侵袭和统治下也有文学。

抗战八年，上海除了从“八·一三”开始的三个月鏖战以外，是四年挂零的“孤岛”时期，不到四年的沦陷时期。但错杂的形势，艰苦的环境，交迫的饥寒，血腥的镇压，都没有阻止上海人民对日本武装侵略者自始至终的抗争，文学抵抗运动是其中坚强的一翼。

“孤岛”文学是用热血和热泪灌溉起来的，它是抗战文学的一枝，却又有自己鲜明的特点。短兵相接、血肉淋漓的斗争，激发起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与抗暴精神的高度升华。无论从文学角度看，从历史角度看，这都不是无足轻重的事件。

党是领导核心，进步人民是战斗主力，抗日爱国统一战线是广泛的集合体，文学界（旁及戏剧、电影、新闻、出版）也不例外。斗争是多角形的：对日本侵略者，对汉奸，对妥协投降倾向，对乌烟瘴气、粉饰太平的恶浊氛围，还有抗战阵营的内部矛盾，斗争的锋芒有如辐射。光与暗，红与黑，热与冷，崇高与猥琐，圣洁与卑污，慷慨激昂与陆离光怪，组成一幅对比鲜明，色彩强烈而布局繁复的图画。

因为时间的侵蚀，人事的代谢，火热的现实一成为过去，就象鲜艳的花卉变成萎黄的标本，以至于逐渐零落。只有依靠大量的

史料故实与文学成品的钩沉索隐，披沙拣金，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南，博闻实录，笔底春秋，才能使事实保存原有的光泽。而折戟沉沙，打捞磨洗的工夫，就显得特别重要。

闭关锁国，思想壅塞的结果，是既看不见世界，也看不清自己，文学上的某些倒流现象就是如此。上海“孤岛”和沦陷时期的文学，早成为有些国家的研究对象，有的且已有成果，我国反而瞠乎其右，即是一例。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这方面的劳绩弥补了这个缺憾，很值得关心祖国文史建设者的襄赞和欢迎。

年光奄忽，记忆也将随之而漫漶，由目击身经、亲与其役者及时回忆笔录，梳栉核实，无疑是难得的活材料。而岁月不居，生命有涯，不少当年卓有建树的前辈，不幸已长眠地下，他们本身昭如日月的事迹，也已有待于相知者的缅怀追记。这就充分说明这项工作的迫切性，更应与流光争驶，急起直追了。

《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将辑集付印，抱病受命，爰抒所感，敬为小引。

一九八一年九月九日

## 目 次

- 小 引.....柯 灵( 1 )
- 上海“孤岛”时期文学工作回忆片断.....蒋天佐( 1 )
- 上海“孤岛”时期的党和文艺界.....杨 帆( 12 )
- 回忆上海文学界的四年间.....赵景深( 20 )
- 《鲁迅全集》出世的回忆.....宜 闲( 24 )
- 回忆一九三八.....胡仲持( 27 )
- 《鲁迅全集》编校后记.....许广平( 30 )
- 关于《鲁迅全集》的校对.....唐 弢( 41 )
- 回忆《鲁迅全集》的校对.....蒯斯曛( 44 )
- 斯诺记述毛泽东同志对《西行漫记》的评价.....( 47 )
- 胡愈之谈《西行漫记》中译本翻译出版情况.....( 50 )
- 复社与胡仲持.....胡德华( 54 )
- 关于行列社.....锡 金( 66 )
- 北社始末.....陆象贤( 86 )
- 关于《上海一日》.....梅 益( 96 )

关于《大时代文艺丛书》和《剧本丛刊》……………朱联保(101)

## “孤岛”文学的主要阵地

——抗战初期《文汇报·世纪风》的回忆……………徐开垒(104)

《鲁迅风》话旧……………巴人(117)

《鲁迅风》掇忆……………金性尧(122)

王统照与《大英夜报》副刊《七月》……………秦瘦鸥(131)

追忆《大陆》……………裘柱常(134)

## 朝花夕拾

——记一个冲破“孤岛”沉寂的文艺刊物……………吴岩(140)

“孤岛”时期的郑振铎……………高君箴(149)

回忆“孤岛”时期的郑振铎同志……………吴文祺(161)

疾风劲草识良师……………周一萍(180)

一座文化宝库的抢救经过……………郑尔康(183)

“活埋庵”里的文学活动……………柳无忌(189)

杂忆“活埋庵”……………柳无非(209)

回忆麟瑞……………柳无非(212)

回忆上海社会科学讲习所……………徐达(216)

忆“鲁迅思想座谈会”……………卢蓀冬(230)

和许广平先生在一起的时候……………木圭(240)

“中教联”的文学活动……………俞荻(245)

“孤岛”文艺钩沉……………钱君匋(254)

“孤岛”文艺细流……………钱今昔(261)

回忆“孤岛”时期的文艺战友们……………范泉(268)

“孤岛”时期上海的戏剧运动·····	姜椿芳(277)
我们还在战斗	
——“孤岛”剧运识微·····	舒 诤(290)
回忆爸爸阿英在“孤岛”上的	
创作活动·····	钱 璎 钱小惠(302)
父亲阿英和李之华同志的友谊·····	钱小惠(310)
“忍看朋辈成新鬼”	
遥祭钱毅·····	李 一(315)
回忆往事，缅怀战友·····	吴 铭(326)
上海“孤岛”时期的改良平剧运动·····	吕君樵(333)
追怀蛰居时期的耿济之·····	钱福芝(352)
怀念耿济之·····	赵家璧(359)
我在“孤岛”时期认识的傅雷·····	楼适夷(372)
董秋斯同志在“孤岛”·····	凌 山(379)
坎坷的历程	
——回忆孔另境在“孤岛”期间的文艺活动·····	金韵琴(389)
我和木斋相处的一段日子·····	赵素娟(403)
忆周末斋二三事·····	陆象贤(408)
回忆亚美书店·····	徐 达(413)
光明书局琐忆·····	王子澄(425)
少年出版社片断回忆·····	丁 裕(430)
编后记·····	(438)



## 上海“孤岛”时期 文学工作回忆片断

蒋天佐

对上海我是有特殊的依恋之情的。解放前大约二十年间的艰辛岁月，我一大半是在上海度过的；不在上海时也对上海深深怀念着。但应该承认，我对上海的了解是极其有限的。至于文艺工作，虽曾做过一些，却毫无成绩，自然说不上有什么很好的体会；对文坛情况所知尤为不详。有些曾经亲历的事，现在则由于健康恶化，记忆衰退，回忆起来也就犹如雾中看花了。但我觉得搜集整理上海文艺工作史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我如果能够尽我一点微薄的力量提供一点材料或看法，是应该引以为幸的。

所谓“孤岛”，这个说法自然是不完全确切的。地域虽仅限于英法两租界，其影响所及则何止千百万倍？但任何一个比拟的说法，其确切性总是相对的。如果“孤岛”二字是形容上海当时这一小片地区突立于周围的广大敌占区之上，那还是恰当而鲜明的。请勿误会我是在咬文嚼字。我是想强调，“孤岛”不孤。上海在任何时候也没有成为真正的孤岛。它与别的地方，无论是广大的敌占区，无论是乱哄哄的蒋管区，无论是英美的远东前哨香港以至南洋，都有着数不清的实质的和精神的联系。经济上如此，政治上如此，文化上也如此。拿文艺方面来说，有书刊的交流，有作家艺术家们的来往，有文稿的互投，有文艺问题的互相讨论，等等。自然，这

些交流当时在数量上都比较有限，有的甚至极少，但所起的作用，有时却是很大的，难于估量的。例如《鲁迅全集》的传入根据地 and “大后方”，其影响如何估计呢？再如《文艺阵地》这个由茅公挂帅的重要刊物，又在香港编，又在上海编，又在“内地”编，这也就可以看出这几处地方相互联系的密切。大约一九四七或四八年，我曾写过一篇小文章（在上海同时也在香港发表）表达了我的一种看法。我认为抗战后的全国文艺运动形势与战前有很大的不同，大体上存在着三个地区的三支队伍：一支是活跃于延安以及广大华北敌后根据地的文艺队伍；一支是活跃于所谓“大后方”的文艺大军；还有一支队伍，则是在上海和华东许多城乡以至香港这个所谓“东方门户”等处奋战不息。当然，队伍虽然分散，直接、间接的领导中心却只有一个，这就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抗战后到解放前夕，在这差不多十二年的时间里，上海文艺工作也几经变迁，粗略地说可以分做三个时期：即从抗战爆发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是第一个时期；太平洋战争到日本投降，是第二个时期；日本投降到上海解放，是第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非常活跃的；第二个时期则是沉着、坚毅的；第三个时期则又是非常活跃，而且斗争非常复杂的。自然，每个时期也许又能分成若干阶段，这一点我还没有细想过。但是第一个时期，很明显地分成两段。第一段是上海沦陷之前，第二段是沦陷之后。现在所谓上海“孤岛”时期就是指这第二阶段而言。这一阶段的特点就是从极短暂的沉寂到大奋起、大发展。短暂的沉寂是随着上海的大撤退，文艺队伍的大分散和上海的沦陷而来。轰轰烈烈的第一阶段过去之后，留下来的一部分人，用很短的时间整顿队伍，讲究策略，占领阵地，重整旗鼓，以利奋战。这跟太平洋战争后的第二时期的沉着、坚毅的地下工作是不同的，那时日军不仅占领了上海“孤岛”，而且占领了香港、南洋，我们的抗战文艺工作除极少数利用“苏方”名义作掩护的

活动之外,都及时地转入地下或转移到敌后根据地去了。

“孤岛”时期有四年多。时间虽不太长,而文艺上呈现出五彩缤纷、百花竞放的景象。老作家们愈战愈强,新作家纷纷出现。文艺书刊的出版之丰盛,我个人的印象(这完全是主观的印象,缺乏任何统计资料作为根据),似乎比战前并无逊色,而“人手”自然少得多了。例如不朽的《鲁迅全集》的出版,《西行漫记》的流传,都是众所周知的。但是研究文学史,当然要从比较广大的范围着眼。就当时的情况而言,一些新闻出版物,如《译报》、《文汇报》、《大美报》等,都是不可忽略的。这还不仅是指它们的“文艺副刊”。例如《译报》,其本身的存在就是对于抗战以及抗战文艺的一种支持。在我的记忆中,当时上海青年们心目中的《译报》和《译报周刊》、丛书等等,就是最突出最光辉最坚决的抗战堡垒。人们半公开地称呼《译报》是共产党报,甚至把《译报》同人都看作共产党人。所以《译报》的文艺副刊以及其他版面的文艺作品,虽然并没有什么不朽的巨著,却无疑地产生过极为巨大的作用,这是不容忽视的。很有说服力的一件事就是当时各行各业的青年中涌现出了许多“译报读者组”,或“读报组”。后来就发展成许许多多的读书会、讲习会等群众性的进步文化组织;这些分散的零星的小组又各自办了许多的壁报、油印刊物等等,真是盛况空前。同时,一些有计划有组织有一定物质条件的业余大学、补习学校、讲习所等也适应需要而产生,这些汇合起来就形成一个汹涌澎湃的革命的抗战文化运动高潮。其中当然也包括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领域,例如戏剧方面,各工厂、企业、学校的演剧组和小型业余剧团,为数是很多的。它们与那些大型的或职业的剧团的配合和协作是很有成效的。这些现在都不叙述。现在要特别提一提的是文学方面的“文艺通讯”运动。这个群众性的文艺写作运动,是同那时文艺界所发起的“上海一日”征文运动有关系的。“文艺通讯”不仅吸引了不少专业作家参加,更主

要是培养了大批业余的创作人材，团结了数以千计的文艺青年，并且组成了一支有几百名积极分子作为骨干的有组织、有统一行动的战斗队伍。他们还有自己的机关刊物，最初似乎只是作为特刊附属某些报刊的副刊，后来出了自己的专刊，记得最初好象是小报形式，后为杂志形式。文艺通讯运动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来，出于党的地下工作的战略、策略上的考虑，根据地下党委的决定，及时地放弃了这一组织形式，而将成员划归了各个职业部门的群众团体。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这个措施是完全正确的。从这件小事，也可以看出我们党对地下工作的领导艺术是何等成熟。明于此，也就比较易于理解，上海地下党组织，从抗战刚开始时的零零落落状态，到了解放前夕，竟已发展成为那样一支拥有上万地下党员的、坚不可摧的、威力无比的、组织严密的钢铁队伍，这是并不奇怪的了。说到这里，顺便说一件事。有的同志告诉我，锡金同志在一篇回忆录性质的文章里说，一九三八年尾他到上海，一九三九年春参加了一个“文艺中心小组”，其中有他自己和王任叔、戴平万、林淡秋、蒋天佐和钟望阳等六人，定期开会，从此以后“孤岛”文艺工作才成为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的了。这当然是错误的，可能是他误会了。这几个人有一个碰头会，这是事实；但那不是什么中心组，而是一个编辑工作座谈会，或者称为“编辑联席会”也可以，根本不是一个党的组织。“孤岛”文艺工作早已是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着的，地下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机构也是早就建立了的。最初是“文委”，后来由于地下党组织本身领导体制的改变，取消了“文委”，成立了“文总”。不过这些说起来似乎离题太远了。但是抗战初期上海文艺运动的蓬勃发展，确实是同中国共产党的威信和影响在全国的飞跃高涨分不开的；是同党所领导的各条战线上的进步的群众运动的高潮分不开的。当然，也是同文艺界各个部门的同志们的团结协力、艰苦奋斗，付出了无限辛劳的巨大的创造性劳动

分不开的。

我们现在回忆当时的文学界，特别不要忘记坚持在“孤岛”的郑振铎、陈望道、许广平、周建人、胡愈之、郭绍虞、方光焘、夏丏尊等师长。茅盾同志离沪较早，但他不仅继续经常关心上海的文艺工作，还写稿给上海以支持。夏衍同志离沪南下之前还对留下的同志作了许多嘱咐和对工作作了安排，贡献是很大的。适夷同志返沪较迟，也许是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吧，我们分别多年，又得相见，十分快慰，但当时的环境迫使他只能深居简出，他除了为编辑出版《文艺阵地》、《大陆月刊》和一些单行的丛书负担了主要责任之外，自己还有不少作品和译品，更重要的是他还为党的文艺统战工作作出了很多的贡献。在“孤岛”文学战线上走在最前列冲锋陷阵的则有梅益、王任叔、林淡秋、石灵、戴平万、林淙、于伶、钟望阳、殷扬、萧岱、王元化、辛劳、阿英、魏金枝、蒯斯曛、高之芬、满涛、锡金、黄峰等同志。还有姜椿芳同志，他的突出贡献是难忘的，他不仅作了许多翻译工作，尤其是做了许多重要的组织领导工作，人们一般不大知道。说起来我想到一件小事，有次我到王任叔同志家去，他指着他的一个笔名“廖化”给我看，我们相视而笑，他的心情我是完全理解的。说实在话，当时置身于抗战文化工作的前列，其危险性是不亚于十年内战期间面临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的。比作冲锋陷阵的战士，有何不可呢？《文汇报》、《译报》的被炸，刘湛恩的被刺，流血的恐怖，正是敌人的政策目标。因此我对许多爱国作家坚守阵地与民族共存亡的壮志倍感敬佩。其中如师陀、唐弢、柯灵、陈西禾、朱维基、芳信、周木斋、孔另境、李健吾、赵景深等同志，奋战不懈，埋头苦干，成绩卓著，为广大读者所重。有些同志终因抗战工作而受残害，如朱维基、柯灵同志，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特所捕，是受尽酷刑而坚贞不屈的中国人民的好男儿。当时崭露头角的比较年轻的新手则有蓝烟、谷斯范、包文棣、何为、越薪、徐微、洛

雨、华铃等同志。洛雨、华铃两位，是风格不同的年轻诗人，可惜这几十年来我对于他们彼时以后的创作活动或其他情况都毫无所知，但我应该承认，他们当时的作品（华铃出了好几本诗集）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是一些值得吟味的诗歌的记忆，虽然具体说起来已是一句也记不得了。上面提到的这些文学界的师友，也真可以说是我的师友，因为都是我所认识的，固然交谊的深浅和久暂大有不同。当然我所亲知亲见的人究竟很少，所以当时在上海文艺工作中尽管还有许多活跃的作家，我却想不起来了。我也的确不愿去回忆往事。对于我个人而言，回忆只是徒增凄苦。你看，仅仅在这几十个人中间，有多少已经作古了？特别是每一想到深交几十年的被我看作兄长一样的任叔同志，抗战初期相识的比我还小几岁的满涛同志，由于不同的而其实又是相同的原因而被林彪、“四人帮”一伙迫害致死的情况，我的心就绞痛。就说石灵同志吧，固然是死于五十年代初期他担任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期间，但他年华正茂，四十多岁嘛，何至于就溘然长逝呢？我想到从前同他的接触。他的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他的忘我无私的献身精神，他的幽默的语言和声调，他的活泼而温和的眼光，结合着他的蜡黄发青的脸色，发黑发紫的被烟熏熟了的手指和嘴唇，构成了一幅三、四十年代苦难的中国的苦难中的“革命知识分子”的肖像。我每到他家里，那间阁楼似的小房子，吱吱作响的楼梯和楼板，面色憔悴的妻子和病弱的孩子们（也许最初是一个，后来是两个），明白无误地不必借助于语言就向我透露了他们生活的艰苦。环境险恶、工作繁重、睡眠不足、营养不良，这样长期间生活下去，就种下了他短命的祸根。他对这段时间的文艺工作有很大的贡献。他修养深厚，才思敏捷，善于运用各种形式，小说、剧本、杂文、诗歌、翻译，无所不能，用许多笔名发表过许多作品。他还做了许多编辑工作，例如影响较大的《奔流》文艺丛刊、《文学集林》、《鲁迅风》等，他都参加了

编辑。他是中共地下党员，原属高教界，后转文艺界。还有辛劳同志，也是地下党员，他是抗战前出现的一位革命诗人，他的诗作不多，我也不知道他曾否出过诗集，但他的诗同他的人一样，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拙于言词，而心热如火，气壮山河。他的个人事业也同他的美好的爱情一样，夭折得太早。抗战初期他就从上海文坛投入了新四军的战斗行列，后来在苏北遇难。

我们回忆历史，当然不是为回忆而回忆。研究历史，也不是为研究而研究。我们是要从中得出有利于今天的教益。我觉得，说到“孤岛”文艺工作，就不能忘记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也不能忘记在贯彻党的政策中的两条战线的斗争。今天这个问题特别值得我们深思，因为反极左流毒仍然是迫切需要的。但是我的水平很低，姑妄言之而已。我以为，文艺上的统一战线问题，固然是作家们之间、艺术家们之间的政治关系问题，尤其也是文艺思想上的民主问题。不同的文艺思想的存在，是客观的事实；人们有着不同的艺术爱好和对事物的不同认识，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有不同就会有争议，这有什么不好呢？口头上说起来，人们都承认“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才是春”；可是做起来，有些人却硬是“唯我独尊”，“唯我独香”。有的人还不仅企图在艺术上强求一律，定天下于一尊，而且动辄用一顶政治帽子去给人“定性”，实在极为不妥。我觉得，在“孤岛”时期，总的说来，文艺界的风气是好的，也可说是很好的。争论是时有所闻的，往往还是很有意义的。但是扣帽子打棍子的事真是不多的。例如关于“鲁迅风格的杂文”的争议。阿英和任叔都是左翼老作家，当时又同是站在抗战的前列。但是由于对鲁迅的认识有差别，对杂文的界说有不同，争论起来了。我已经记不清我是否参加了后来为解决争论而举行的座谈，但是无论如何可以肯定，在当时，固然阿英并非完全孤立，而任叔观点的支持者、同情者究竟为数较多。如果任叔他们不能及时打住，而对阿

英群起而攻，联系他在二十年代末就攻击过鲁迅的事（“历史”），给他扣一顶大大的帽子，横施挞伐，其结果又当如何呢？是有利还是不利于当时的文艺工作呢？那对于阿英同志个人的影响，我看也将是并非积极的。在解放后，我在同他的接触中得知，他对鲁迅和杂文的看法已有不同，这不是很好的吗？再如对于上海沦陷后的文艺工作如何认识，是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这不仅关系到如何评价在当时复杂而困难的环境下好不容易取得的一些可贵成绩，尤其重要的是关系到对前途的估计，关系到对坚持上海文艺阵地的信心。这时有些同志的确是过于悲观失望了。记得影响比较广泛的是在戏剧界，有一位同志在香港的一个刊物上把上海的戏剧工作描绘得很糟，引起了上海同志们有力的抗议。但是随后这位同志接受了批评，在刊物上公开承认了错误。这种风气，我认为至今也仍然是值得我们赞扬的。抗日统一战线，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除了必须以政治上的爱国抗日为前提外，文艺上的天地应该是极为广阔的。因此，“孤岛”上的各式各样的文艺工作者抗战的动员是十分广泛的。的确是鸳鸯蝴蝶派、才子佳人派都发生了分化。新文学作家中间，一向比较疏远的李健吾、赵景深等，也变成了与“左翼”合作共事的积极分子。这有什么不好？我认为很好。我想不妨在这里再饶舌一下：有一位同志在日本投降后走过一点错路，有的同志就据而怀疑过去的合作。不久，国共重开内战的局面已成，他也就幡然悔悟，挂冠引退。这岂不是仍然值得欢迎的吗？过去的一段合作，很可能对他后来的觉悟还是起了好的影响，所以完全不必有什么怀疑。我重提这件几十年前旧事，我深信这位同志不会怪我，也不会误解我。当年上海文艺界的同志们如于伶、钟望阳、王元化、柯灵、唐弢等，对于这件事也大多早知其详，无须我来作“揭发”。我之所以不惮冒昧陈词，是为了说明一点，就是：统一战线决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党的根本的坚定不移的长期方针。毛泽东



同志早就指出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三个法宝，三者并列，其意可知。毫无疑问，新文艺运动是以左翼文艺运动为核心为领导的。但新文艺运动也是各家各派反帝反封建文艺的共同的事业。不管你提不提统一战线的口号，不管你怎样称呼它，客观上存在的总是一个统一战线的新文艺，这是事实。包打天下办不到，包办文坛也行不通。当然，左翼文艺的领导地位是不应怀疑的，不应削弱而应发展和加强的。但这不能靠标榜“唯我独革”、“唯我独尊”而达到。反之，只有靠大家来革命、大家有自尊才能达到“左翼”领导地位的加强和巩固。一言堂是终究站不住脚的，古往今来，前例昭昭。政治上尚且如此，何况在千姿万态的文艺领域呢？

还有过一个所谓“无关抗战论”之争，我认为也是很有意义的。这个问题原是所谓“大后方”有人提出的，后来波及上海，有人出而响应，自然也就引起了批评。不用说，一切献身于抗日救亡工作、愿以文艺为民族解放事业而斗争的积极分子，都是反对“文艺与抗战无关论”的。但是通过讨论，大家的思想认识都有所提高。例如认识到抗战文艺并不是“战争文艺”或必须以战事为题材的文艺，因而大大解除了许多缺乏战争生活体验的文艺家的顾虑；认识到抗战文艺问题主要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或政治倾向性问题，而不是对题材、风格、样式有什么限制；也认识到对所谓“抗战八股”也应有所分析，而不能一概鄙弃或一味纵容。当然，由于当时当地大家思想认识水平的有限，并不能解决所有的疑点，甚至也未尝能够很好地有系统地解决上述各点。但是，回想起来，无论如何，对于加深和提高我们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复杂性之认识，是很有好处的。

还有一个关于“个人主义”的争论，不记得卷入了哪些人了，只记得任叔是有份的。有人说，应该提倡一点儿个人主义，发挥一下